

新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问题与对策

李 晖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 新疆自古以来“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聚居形式为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在文献研究基础上,以经济、区位因素、教育文化为背景,选取学界针对“非遗”问题面临的角色定位、文化冲击、商业运作、法律空白等研究观点,对新疆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承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以主导民族文化圈为区域分布特征的新疆“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正面临着地理区位跨度分散;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少数民族文化素养普遍较低等影响。表现出保护主体—传承主体角色定位混乱;时代变迁与商业进化造成的“非遗”本真性破坏;少数民族文化竞争力与外来文化协调保存能力羸弱;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认同、文化自觉认识不足;针对性法律法规缺乏等问题。着重通过政府间三段式管理协调;商业活动带动;职业教育与地区定点帮扶;校园入驻与“非遗”民族团结宣传;完善“非遗”法律法规细节建设等角度提出解决对策。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自觉;本真性;主导民族文化圈;文化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 G 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7)06-0022-08

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是什么?这个看似平常的文化概念亦如所有新生事物从诞生到成熟一样,需要经历一段并不平常的内化接受过程。历史倏忽之间,留存至今的形象表达,为我们留下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印记。载体多种多样,精神殊途同归,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高度概括。当口传心授、工艺技法,亦或是精神活动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幅从传统到变迁的文化图景之时,艺术的绚丽多姿在当今大行其道的快餐式文化之中绽放出了其独有的色彩。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概念更迭就属于一个在辨析中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在社会发展与历史的进步过程中,有形与无形的文化构成随着时间的渐进,从文化表象的初步阶段不断向文化遗产到文化内涵的方向内化。对民族和人类来说,作为同样饱含情感深度的记忆传承载体,物与非物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作为极度依赖人类生产活动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之下更加脆弱,保护难度更高,

面临趋势更加严峻,已是不争的事实。时代迁延仿佛如迷局一般困住了这些保留在人类精神家园中珍贵却易失落的美好。机缘巧合中重现于世,并再一次焕发生机的“非遗”自然值得关注与珍视,但更多的“非遗”却常常处于被世人遗忘,甚至毫不熟悉以致悉数凋零的境地。新疆以其民族多样性为重要标志,为我国“非遗”大家庭注入一股别样的内容。但即使是以民族数量为文化多样性支撑的“非遗”遗产也敌不过社会复杂环境流变所造成的影响力衰微。这究竟是因为什么?这一疑问的解释同样复杂。本文将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承特点中提取素材,选取部分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来看待新疆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承问题,并提供一些解决对策。使读者能够较为明确当前“非遗”保护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这对于我们理清“非遗”保护关系、完善人为自身、出台针对性措施、提高思维意识等方面大有裨益。

一、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分布统计

新疆“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聚居形式是这片广袤土地自古以来能够接受到文化多元碰撞的一个内在原因。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知，目前新疆全区常住人口21 813 334人，其中汉族人口8 746 148人，占全区总人口的40.1%；其余各族少数民族人口13 067 186人，占全区总人口的59.9%，比汉族同胞高出19.8%^[1]。丰富的少数民族群众资源，自然随之带来了多样瑰丽、极富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古丝绸之路联通西亚与中原腹地的中转站，造就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以维吾尔、蒙古、回、哈萨克、塔吉克、柯尔克孜族等一批“非遗”承继丰富的艺术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国家与各地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在短时间内并不能转变其保护与传承所面临的风险与困难。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活态流变性，决定了其包含的“文化记忆”更容易随着时代迁延与变革被人们忽略或忘却。一旦保护与传承过程中出现问题，结果往往伴随着一种“非遗”项目的失去，而失去了寄寓在其中宝贵的人类智慧和精神血脉，无疑这损失不可估量。

以新疆为例，2008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截至2015年初，新疆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共293项。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地域分区研究显示，新疆“非遗”主要以“传统手工艺、传统音乐、民俗、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舞蹈与相对稀缺项目，传统医药、曲艺、传统戏剧”构成^{[2]6}。整体呈聚集分布，区域间呈非均衡集中分布。主要分布在喀什、伊犁州直属县（市）、乌鲁木齐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这四地区“非遗”项目总数达到全疆总数的一半，各地“非遗”项目呈组团式分布，民族性地域文化主导性显著。将新疆全区按照内部区位划分为北疆、南疆与东疆。北疆以乌鲁木齐、伊犁州直属县（市）为核心的“非遗”项目共有168项，占全疆45%。除去无法甄别民族或是可忽略不计的

干扰因素，北疆共得到了124项“非遗”项目。其中哈萨克族48项、锡伯族18项、蒙古族14项、维吾尔族11项、俄罗斯族7项、回族7项、达斡尔、塔塔儿、乌兹别克、满族较少。以喀什地区、巴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为核心的南疆“非遗”分布共166项，仅次于北疆，占全区的44%。包括传统手工技艺、传统音乐、民俗、民间舞蹈。同样除去干扰因素整理得出122项代表名录，其中维吾尔族73项、柯尔克孜族14项、蒙古族13项、塔吉克族8项，具有明显的维吾尔民族主导性；吐鲁番市与哈密地区共37项“非遗”项目成为了东疆“非遗”文化核心，共占全区的11%。同样以维吾尔族为主，同时夹杂汉族某些文化特征^[3]。

二、新疆少数民族“非遗”当前区域特征

通过以上调查，不难看出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占主导民族文化圈分布的区域特征。然而，对于开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新疆的难度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区域广阔，“非遗”分布零星，保护半径过长

文化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地理跨度决定了相互交流与协作的难度系数。从内部体现来看，少数民族聚居表现为大体聚合、实际分散的特征。可以理解为总体上被核心地区包括，但同时又出现如农牧区非固定迁移、自然村聚集、山区河谷地带定居与固定乡镇村聚集等新旧结合的多因素实际分散居住模式。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新疆主要少数民族统计人口城市化率显示，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哈萨克族、回族、塔塔尔族人口城市化率分别为22.04%、18.18%、15.49%、22.4%、33.48%、47.97%，均低于50.27%的全国平均水平。这间接反映出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目前仍以相对落后的多样化居住方式为主。因此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性内涵本民族本地区保护，使‘非遗’成为‘活’的文化符号”这一原则下，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落后地区对少数民族群体保护与传承其携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客

观上造成了困难。

2. 区内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北高南低”趋势明显

据统计,2016年新疆全区国民生产总值9 617.23亿元人民币,同比6.9%的增速排名全国第八,可内部各地区间的经济差异相对较大^[4]。新疆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能源化工、技术密集型科技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林果业与进出口贸易,并且具有明显的城市晕轮效应。即大城市、资本密集型区域周边具有发展速度较快、经济状况较好。以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为代表的北疆大城市吸收了全疆一半以上的优质资源。集中资源,由点及面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整合优势、有针对性地发展优势不言自明,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总体分布北疆高于南疆、发达城市高于普通城市的现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主导趋势南北疆均占有重要地位而言,这种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将不利于“非遗”保护和传承。再考虑到虽然对于“非遗”保护与传承是以自治区为主导的政府与社会协作活动,可是相对于“非遗”项目挖掘、申报、建档到“非遗”传承人的申报、保护、补助等细节化、具体化工作除了依靠国家与自治区的统筹,归根结底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地方协作。由此得出,普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却拥有数量众多“非遗”与传承人的南疆地区,其保护与承续压力权重大于北疆地区。

3. 地区教育文化水平差距显著,民族集中区更甚

作为固定于产生地文化的软体存在,对于保护与传承自当首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本身作为保护与传承的主力军,能否对本民族“非遗”产生足够的文化认同对保护与传承效果至关重要,为此基本的文化素养与先进意识不可或缺。据教育部统计,目前新疆全区教育文化事业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王晓君^[5]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结合中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率与不同类型教育的计量模型,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出了“中国少数民族受教育程度有限,高学历层次人才奇缺”这一普遍结论。少数民族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水平为9.3%,新疆少数

民族实际受高等教育水平可能更低。介于此情况自治区也制订了在2020年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教育发展规划。因此从目前来看,新疆全区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状况与经济大致相同,呈现出北高南低、东部优于西部、城市—县乡镇—农村农牧区逐级走低等全国普遍发展现状。少数民族主体受教育程度与文化保护与传承意识的生成呈正相关。基于新疆少数民族数量多、民族丰富,南疆民族聚居密度高于北疆等特点,“非遗”保护遇到的意识支撑在少数民族群体中还并未形成强有力的共识,或者说由于文化素养差异,少数民族群众对“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认识还比较欠缺。

结合经济状况的不利因素,对尚处相对贫困的少数民族而言,物质的保障自然需要放在首要位置。供养家庭的精力消耗程度、接受教育的可能,都需要依据经济状况的提升才能得到适度改善。从大范围讲,“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目前所面临的突出困境表现为以上三点。客观因素的影响固然重要,但还不能得出将全部责任单纯归结于客观因素不达标所造成的现有困境这一结论,特别是这些影响因素能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得以改善,这同样也是学界甚至社会认可的观点。

三、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问题的原因分析

学界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特别是保护困境与对策的探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探索出了生产性保护、博物馆式保护、产业化传承、民俗文化旅游等市场化时代保护与传承的新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大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些濒临灭绝的小微文化代表当中来。优点与缺点并存的批判与肯定,持续关注与探索更加贴合的保护与传承思维与操作方式,是学术界不断挖掘“非遗”课题的兴趣所在。根据当前研究成果,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遇到的问题与发生原因,学界已经有了相对统一的认识。

1. 政府、学界、社会权责区分混乱,三方配合考虑不足

从角色认识而言,温州大学黄涛^[6]从保护主体民众、社会与政府之间角色悖论切入,认为保

护主体——传承主体应当分工明确。目前的角色定位过于混乱，政府应当发挥其强有力的管控能力，对保护起到积极作用而不是利用其权力干涉内部“非遗”传承的运作。并又提出“非遗”保护主体应当是“处于传承圈外，虽与传承无关，但对传承起重要推动作用的外部力量”。赵德利认为文化学者才应当是“非遗”保护的主脑，能够为“非遗”提供较少功利性、学术性意见。民间是“非遗”保护的主体，民间为“非遗”存在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如若离开则难以为继。官方是“非遗”保护的主导，调控能力、资金支持是基本参与手段。其余学者普遍就当前保护形式易走向极端或多或少表现出担忧。政府主导本应是好事，如若控制不当，强有力的行政操控对“非遗”本真性产生损伤，干扰规律的自发进行。参与者与外来领导、专家间的主体地位扭转，使文化自觉运动沦落为在领导指挥下的群众集会。

这一现状产生由来已久，原因主要归纳为集权化思想持续左右专业建设。这是从特定时期继承下来的传统思想。一方面的确在特定时期具有诸如迅速整合资源，避免不统一带来的行动力疲软、方便集合管理以及发挥优质力量有针对性改造等优势。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过度集权，限制了学术界、社会等同样不可小觑的保护力量的涉及，使部分通过学界或者社会参与就可以产生良好保护效果的“非遗”工作，受到政府干预导致无法或者不能完全得到实现，例如繁琐的保护行为申报、审批得到诸多阻碍，影响保护效果或时效；就是政府不完全明确学界与社会意图，导致误解现象频发，指挥错误、干预失当。三者关系没有根据自身条件得到良好协调，可以说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2. 商业时代挤占“非遗”生存空间，保护意识淡漠

由“非遗”开发出的商业演出一则对民俗传统进行商业包装的同时，也针对其中没有商业价值的内容进行着改变。对于“非遗”本真性的特点并不注意，或者说只关注形似不关注神似。二则旅游公司承包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项目后要求群众在当地进行单纯为吸引观光客消费的重复式文化习俗表演^[7]。政府部门对能够给予当地“政

绩”带来利益的行为通常也是默许，很少对其操纵的不合适行为进行干预。生存环境的愈发现代化，为少数民族长久以来的生活提供了新范式。作家迟子建在其荣获茅盾文学奖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便展现了以游牧、狩猎为生的族群逐渐随着时代进步选择了接受更加先进生活方式，最终留下了主人公与其孙辈于山林中共同守护属于这个民族最后灵魂的震撼历程。从取材于史实的文学作品中，折射出民族在面临时代变迁最终的舍与得。商业利益所带来的吸引无疑是巨大的，而保护意识淡漠愈演愈烈，只有能够真正懂得其中价值的人，才能够寄希望于参与保护。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开发商仍旧是出于经济利益考量居多，再加上少数民族主动与被动选择的生活方式是时代赋予的进步表现，与此同时精细化物质与意识也在逐步挤占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原因还是一个进步意识与商业利益协调发展认识不足的问题。

3. 社会意识更迭致使技艺承续面临人才断档问题突出

社会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竞争力的影响是近年来造成学界持续担忧的新关注点。生存环境压缩、现代化意识与生存方式普及、市场经济感染力日趋增强、谋生与继承技艺的两难选择，考验的是“非遗”本身能否拥有后劲的现实状态。少数民族对于本民族文化认同感是民族文化竞争力的核心，但是这种认同危机现如今持续发酵，无形中给现代文化取代民族文化提供了机遇。全球化科技的优化组织对长期饱尝相对落后文化区域性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群体来说吸引力不言而喻。价值观趋同，文化自觉性淡漠，使得少数民族中接受能力较强，且又因时代进步而未曾得到过尚需时间巩固的传统文化洗礼的年轻一代，对自己民族文化身份和传统失去兴趣或拒绝接受。以维吾尔族桑皮纸制作技艺为例，除去有意为之的艺术创作与研究用途，桑皮纸的使用市场已经基本上完全丧失。对于桑皮纸作为“非遗”今后的存在保护而言，情势就显得不那么乐观。根据对2007年6月5日被文化部正式确立的吐鲁番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托合提·巴克的采访得知，桑皮纸纯手工制作费时费力，且为保证品质

无法采用工业化形式大批量制作。25 公斤桑树枝, 5 公斤桑树皮, 一天最多能制作 20 张, 5 天才能完成 100 张的制作^[9]。效率极低, 且市场需求量小, 虽然被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 和田墨玉县也投资建设了传承中心, 自治区文化厅也在积极推广桑皮纸绘画、书籍装饰。但需求总量不大, 制约了其生产性保护行为。更重要的是传承人断档现象普遍, 2014 年托乎提去世, 其子土尔逊·托合提继承桑皮纸产业成为第 11 代传承人。他表示与前些年相比桑皮纸“非遗”保护与传承得到了相当重视, 桑皮纸制作令他能够年入 10 万, 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回报, 此外作为传承人每月也能够得到政府 1.68 万元的传承经费^[9]。据了解现在村里的年轻劳动力纷纷选择外出打工, 与有吸引力的城市生活相比, 枯燥、繁琐的手工艺吸引力十分有限, 少有年轻人主动选择继承传统手艺, 这也是几乎所有“非遗”传承面临的共同问题, 从侧面反映出了当前“非遗”传承活动典型的承继困难。对民族遗产缺乏认识, 提不起兴趣。少数目前还能够依靠家族传承的技艺, 这一代际关系的延续也越发显得脆弱。极容易因为代际关系的无法延续, 或者传承人自身因素的转变而使技艺面临失传^[10]。这是单一传承普遍需要面对的风险。群体传承中, 如传男不传女等传统思维, 也同样是限制“非遗”传承的桎梏之一。

4. 文化冲击的选择性竞争对民族文化认识产生影响

主流文化的舒适性与先进性对相对落后地区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最近研究已然表明, 少数民族文化本身就处在弱势地位, 人数越少的族群其面临的文化冲击就越是巨大。包媛媛^[11]提出文化强势的观念——主流社会的强势文化与习俗的浸润都易使某些人口较少、文化积淀不深民族的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文化表现破坏或消亡。这是无法阻止的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外部影响。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内部影响, 究其原因无非源自利益相关与意识认知。费孝通于 1997 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可以说侧面揭示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逐渐式微的内在根源。这一观点认为, 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本民族文化有正确的

自我认识, 并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认识, 是民族文化能够源源不断具备生命力的根本^[12]。那么反过来思考, 少数民族相对封闭的自有文化圈被打破, 外来文化与自有文化形成融合竞争之势, 形成自由文化流动趋势易由于少数民族群体与先进文化协调能力偏弱, 共存保留内容偏少, 不自觉的强势对弱势文化“攻击”造成一边倒的文化唯一状态。少数民族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均处于劣势, 令吸收到先进文化的少数民族群体对自己的文化产生厌恶, 或认同主流文化对自身的歧视, 即“污名认同”, 认为自己的文化落后并排斥自身, 以此产生消极判断的过程^[13]。

5. 法律法规细节覆盖不足, 有待继续扩容

除文化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文化领域强势与弱势间的优胜劣汰等以上由经济、意识、文化、环境影响之外, 新疆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传承困境, 法律法规健全性探讨也是其中被学界关注的重点。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表现在现今法律条文框架足够坚实, 语义上尽可能地将林林总总的“非遗”内容包括其中。但有针对性法律条文缺少, 规章制度法律效力不强, 立法缺乏依据, 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等综合文件并不缺乏。而例如像文化部《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等有所细化、有所特指的配套性、针对性法规相对缺乏。新疆颁布的有关“非遗”保护的法律法规目前也仅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08 年)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2010 年)。各地(州、市)、县(市、区)尚未出台相关配套法规。立法进程, 各方论证需要时间进行调和。通常只能够保证大体上的和谐有序。对于具体问题, 各省之间出现的“非遗”保护与传承问题形形色色, 面临的实际影响具有个性差异, 地方细化规章建立需要有突出案例作为支撑, 才方便开启复杂的法律修订与增补。因此对于地方规章也好, 法律建设也好, 并不是有问题就能得到细致到法律条规针对性建

设的支持。还需要各方协调统筹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对策建议

1. 纠正责权划分僵化思维，发挥三方协作优势

为解决责权区分混乱问题，从政府方面来讲，政府应当首先建立健全“非遗”保护主导规划体系。目的在于保障业内科研团体与普通民众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充填“非遗”保护与传承实际参与内容。例如建立以文化部统筹，涵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自治州）、县、乡、镇、村各级文化管理部门或“非遗”工作办公室、文化站等一体化的文化行政机构。突出“非遗”地区低一级直接接触，中一级密切兼顾，高一级综合统筹的“非遗”工作三段式管理理念。按照各级实际执行能力作为评估重点，细分权责，减轻原先主管部门兼顾不全等问题，真正调动基层对于“非遗”工作的注意力。严格细化因地制宜原则，逐级负责。便于基层在实际管理中发现问题的汇报问题，上一级调动资源解决问题。其次发挥业内研究机构的研究优势，定时召开面向全社会的学术成果报告会、专家讲座，结合博物馆、艺术机构将原先只能够内部交流内部消化的学术活动向社会民众开放。并结合政府组织特定形式的“非遗”表演。由政府牵头，鼓励社会民众“非遗”活动的开展，有选择地将民众自发组成的“非遗”组织纳入行政管辖，提升正规性并提供部分活动资金。并通过其号召力不妨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开展一些邀请“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进社区、下农村活动。让民众能够近距离感受部分“非遗”魅力，并从基层中继续发展兴趣群体，助力“非遗”的进一步传承与保护。政府逐步放权，从行政手段入手为学术界与社会积极参与“非遗”传承与保护提供便利。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协力。

2. 引导商业良性参与，强化地区多点糅合

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仍需正向商业体的参与。以口头与表演为主要形式的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为

例，结合良性商业演出形式对于此门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十分有利。目前新疆以吐鲁番地区鄯善县所取得的成绩为模板，形成了一套由政府牵头，地方企业赞助，推广新疆艺术名片活动。2007年9月27日，投资200余万元的中国第一个木卡姆艺术传承中心在鄯善县鲁克沁镇落成^[14]。县政府为鲁克沁镇吐鲁番木卡姆传承中心投入12万元，购置了乐器、专业书籍及演出服装；投入15万元，对《萨巴木卡姆》《多郎木卡姆》等各套歌舞曲和鼓吹乐曲进行了专题拍摄并制作了光碟，为保护木卡姆艺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5]。2009年，县政府在投入人力物力的基础上，强化宣传优势，联合当地企业开展“广告艺术”结合活动，在商业演出中结合产品渠道推广、企业形象宣传。在大力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内容的时候，联合电视台制作并播放含有木卡姆元素的双语产品广告。不仅成功提升了企业知名度，同时也在广大市民群众中形成了良好的保护意识，为发扬、保护吐鲁番木卡姆提供了群众基础。这种商业良性促进方式也可以为其他“非遗”项目与商业结合提供启示。

3. 突出实际投入效应，开启产业循环自救模式

为切实转变这一现状，尽力维持“非遗”延续。相对比较可取的办法是加强“非遗”传承与职业技术培训相结合。低附加值的传统手工作坊式生产保护，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物化展出。亲代相传的模式也不利于人力资源的扩容。应当纠正传承性别与血缘选择间的封建思想，加大广泛取“才”的思维宣传。政府应首先鼓励职业院校有条件地开展“非遗”专业设置，嫁接好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使用的桥梁。在工艺美术品中适当融合“非遗”意象，发挥经济效益与特定“非遗”活动的自觉结合。从人才就业推广入手，扶持一批有意象参与的民族工艺企业，通过减免税收、降低准入门槛、联系外贸等手段，发展从“非遗”产品到经济回报的对接，以此创造机会均等的就业机会。其次职业技能大赛应当有条件地融入“非遗”生产内容，对以生产性保护的地方“非遗”项目如英吉沙小刀制作、维吾尔扎染技艺、桑皮纸制作等开展技能比拼与交流活动。一方面有助

于将正规学校教育的培养力度深化,保护传承与落实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经济类型单一的民族聚居地区,国家、自治区亦可以通过倾向性扶持,从物质与政策帮助的角度,鼓励上述地区招商引资、开办工厂,推动当地经济转型,减缓人才流失,创造“非遗”保护环境。从根本上解决因经济利益考量所造成的人才流失,使其认识到发展“非遗”同样能够带来可观的效益回报,并主动参与。纠正消极价值观带来的不利影响,让参与者获得全方位的满足。

4. 加强文化传播力度,坚持文化认同构建

民族文化的认同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自治区教育部门从现在开始可以汲取全国部分地区艺术进校园活动的成功案例,灵活变革在全区中小学试点推广“非遗”元素进校园计划。例如在乌鲁木齐、喀什、哈密、库尔勒等“非遗”相对集中且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中小学甚至大学,开展“非遗”二课堂、不定时“非遗”主题班会与展览、“非遗”艺术视频欣赏,有条件的地区学校也可以购买某些实物承载的“非遗”作品,搭建“非遗”宣传长廊等展示平台,轮换展示并结合音像、文字详细介绍。通过潜移默化的意识植入,特别是需要加强民族学校师生的“非遗”意识启迪,让处在接受能力较强时期的学生从小感受到“非遗”文化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对于其余特定群体例如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干部、文化协会会员等人员较为稳定且普遍文化素养较高人群优先开展“非遗”与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以此为契机通过走村入户,发挥政府的模范带头作用,同时结合新媒体渠道向全社会普及。采用这种覆盖叠加推广的形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覆盖到社会各阶层群众,加深印象,从而通过意识宣传助力民族地区的“非遗”文化认同。

5. 鼓励法条研究有序准备,完善法律规章行 进基础

加强有针对性、细节化的行政立法活动,突出地方“非遗”传承与保护。支持“非遗”民俗研究工作,鼓励学界与社会提出意见,降低意见反馈门槛。杜绝笼统且空泛的法律条令,鼓励地方人大有关“非遗”工作的提案生成。组织听取

法学与民俗学专家组就地区“非遗”传承保护的意见建议,完善行政法规的覆盖面,特别是对于那些传承与保护难度较大、濒危度高、市场效益度低的“非遗”项目出台专门法规。独立保护,使得保护与传承工作有专门法规可依。以地方实际开展状况为基础,考虑各地区现实,对法令做出适当调整,增进法的实际可操作性,将保护落到实处。

五、结 语

新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面临的困境可以被看作是目前全国“非遗”工作保护问题的一个缩影。清醒的认识是保护与传承能否起到切实效果的前提保证。保护民族文化有规律的发展是关乎能否传承我国悠久文化多样性特色的国之大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历史的进步固然是以新事物的产生与旧事物的终结为标志。但是同样灿烂悠久的非物质民族文化却并不是需要淘汰的糟粕。相反蕴含在其中的智慧结晶,神秘富有人文温情的形象表达,正是民族内涵的最好体现。我们有责任将其最自然的一面在规律的框架下留存下去。值得高兴的是,新疆“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明确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新一轮的保护专项资金,就“非遗”传承、职业教育发展、文化遗产调查与相关数据库建设、增补“非遗”代表性项目、抢救性保护、整体(分类)保护、展示宣传等方面提供物力财力与人力支持。困境的无数次总结分析反映了社会与政府保护其承续的决心与意志,虽然在新疆少数民族相对复杂的民族形势中推行全面彻底的“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任重道远,但前途终将是光明的。

参 考 文 献

- [1] 第六次人口普查委员会.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R]. 北京:第六次人口普查委员会, 2010.
- [2] 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 修订版.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
- [3] 张佳运, 高敏华. 新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地域分区研究[J]. 干旱区地理, 2016(9): 1129-1132.

-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新疆统计年鉴 2016[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7.
- [5] 王晓君. 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与教育关系实证分析——基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J]. 民族论坛, 2016, 9(23): 18-24.
- [6] 黄涛.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J]. 河南社会科学, 2014(1): 109-117.
- [7] 杨亚庚, 陈亮, 陈文俊, 等. 论宜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J]. 河南社会科学, 2014(1): 118-120.
- [8] 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 [9] 安尼瓦尔·哈斯木, 杨静. 维吾尔族桑皮纸及其制作工艺[J]. 新疆地方志, 2012(1): 46-47.
- [10] 檀畅.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1): 38-40.
- [11] 包媛媛.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的重建[J]. 四川戏剧, 2016(10): 112-116.
- [12] 费孝通.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 [13] 叶芳芳, 朱远来.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 广西民族研究, 2013(3): 197-200.
- [14] 李晓岑. 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手工造纸调查[J]. 西北民族研究, 2009(3): 147-153.
- [15] 杨军.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1): 58-61.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Xinjiang Minorities

LI Hui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 Xi'an Univ. of Arch. and Tech. ,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the ethnic settlement forms of Xinjiang, the large scale of multi-national residence and the small community of one nationality, have provided chances for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brought about problems as well. Based on the document research and such factors as location, economy, education and culture, the paper studies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Xingjiang minorities, especially the issues confronting the academic circles like the role definition, the cultural impact, the business operation, and the legal lacunae.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Xinjiang, where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ominant ethnic cultural circle, are faced with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scattered geographical locations,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gions, and the generally lower cultural literacy of ethnic minoritie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sulting problems as follows. The subject role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is confused in definiti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ruined with the time variation and business evolution. The cultural competence of minorities and the existing ability are weakened in the coordination with foreign culture. The minorities are lack of the ability and the awareness to identify its culture. Moreover the targe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insufficient. According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aspects of the three-phase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the promotion by means of commercial campaig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regional fixed-point support, the campus campaig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promote national unity and the detailed constru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prote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awareness; authenticity; dominant ethnic cultural circle; cultural competence

【编辑 王思齐】